

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再研究

王英维 赵国材 张军

(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,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)

摘要: 中原大战之后, 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, 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, 故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。长城抗战之后, 李烈钧对抗日有了新认识, 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, 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。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, 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, 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, 从整个局势出发, 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, 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。

关键词: 李烈钧; 察哈尔抗战; 长城抗战; 冯玉祥; 蒋介石; 反蒋抗日

中图分类号: K280.1/7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2095-3771(2015)04-0034-05

李烈钧, 字协和, 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, 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。在中原大战之后, 李烈钧虽然淡出政治舞台, 然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·一八事变之后, 他还是抱病出山, 奔走于国事, 来往穿梭于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。在冯玉祥发动察哈尔抗战之后, 他还为此调解蒋冯关系, 使一触即发的大战得以避免发生, 可谓功劳甚著。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关系问题, 学术界已经有所研究。^①现有研究主要观点认为, 李烈钧作为蒋介石安排游说冯玉祥的说客而言, 他违背了蒋的意思, 以实际行动支持冯玉祥筹备举兵抗日。当察哈尔问题陷入僵局时, 李烈钧又成为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的缓冲力量, 他肩负起居中调停之任, 对察哈尔问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。其实, 纵观李烈钧在察哈尔抗战前后的政治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, 对此学术界的研究还尚不明朗, 故本人志在进一步探讨该问题, 以彰这一历史的真相。

一、全力支持: 协助冯玉祥在北方“反蒋抗日”

1929年国民党编遣会议结束以后, 冯玉祥在1929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称: “蒋为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最大障碍, 愿不顾一切, 始终从事倒蒋工作。”^②后来, 终有各派联合倒蒋之举, 于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。战后冯玉祥的西北军全部被瓦解, 其余部虽为蒋、张改编, 皆脱离了冯玉祥的控制。虽然丢掉了东山再起的本钱, 但是冯玉祥并没有就此放弃反蒋工作。石友三、韩复榘密谋倒蒋时, 其在1931年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: “我亦应当帮忙, 尽我心而已。”^③至于李烈钧, 此前支持过冯、蒋的合作, 据冯玉祥称: “后来他(指李)也深自谴责, 认为他自己瞎了眼, 对不起我, 他立誓以后绝对反对蒋的独裁到底。”^④项立岭经过研究也认为, 李烈钧“不主张国民党内分裂, 但他认为分裂的责任在蒋介石。”^⑤故云, 此时的李烈钧与冯玉祥的反蒋态度大体相同。

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“九·一八”事变, 这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, 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目标所在。然而东北军不战而溃, 把东北三省丢给了日本, 蒋介石亦没有具体的抗日行动。冯玉祥1931年11月21日日记中称: “蒋张

王英维(1977-), 男, 副教授, 硕士, 研究方向: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、思想史、民族边疆史。赵国材(1959-), 男, 教授, 研究方向: 中国现代政治史。张军(1971-), 男, 副教授, 硕士, 研究方向: 明清史、北部边疆史。该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《察哈尔抗战研究》(项目编号: NJSY281)。

均袖手旁观。”^⑥当时的政府只一味依靠国联,而冯玉祥认为“徒依靠外力是不中用的”。虽然如此,冯玉祥在抗日问题上还是以大局为重,只要蒋介石表示抗日,有实际行动,冯准备“为国家计,仍当与之和好如初,共赴国难”。^⑦换言之,正如余心清所云:“抗日战争爆发后,冯虽一面反对独裁,呼吁民主,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抱有幻想。”^⑧同时,李烈钧也认识到,“非大家团结起来,一致对外,无以言救国及革命”。^⑨但对蒋介石却非常不满,他认为团结对外的对象是不包括蒋介石的。为此,他还劝冯玉祥在“北方应起倒蒋”。

1932年以十九路军为主爆发了“一·二八”抗战,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支援不力,冯玉祥对此相当不满。1932年九月十九日,其日记中还称:“蒋之计划在彼此牵制,他好从中取利。”^⑩对于南京政府,李烈钧也认为“与南京诸人不容易合作”,“与广东方面尚能一致”。^⑪为另谋抗日之路,冯玉祥于该年10月7日,离开泰山去了张家口。李烈钧对此十分关注,10月17日与程潜等人联名给冯去电称:“弟等以为挽回今日之危局,河朔与南方同关重要。”^⑫换言之,李烈钧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发展抗日力量,以此扩大实力,最终达到南北联合倒蒋的目的。

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组军之初,日本企图支持冯玉祥反蒋。1933年年初,张公干当时在冯玉祥身边,他称“有一次李烈钧、王法勤等反蒋派从南京来了个密电说,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对他们讲:‘冯焕章(冯玉祥的字)如果能在张家口打起(联日)反蒋的旗子,要钱给钱,要枪给枪。’李烈钧的意见,先答应日本人,把枪和钱拿到手再说。这份电报是我交给冯先生的。”^⑬最后,冯玉祥权衡再三,拒绝了日本人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组建,李烈钧参与其中,甚至是为冯玉祥奔走经营,联络各方。

1933年年初爆发了长城抗战,热河处于日军威胁之中。为挽救危亡,南京政府促冯去南京,冯玉祥于1月25日致电给李烈钧称:“中执委会电促晋京,甚盼先生能到京一行,弟拟稍迟再往。”^⑭冯玉祥想让李烈钧到南京以探虚实,究竟南京政府有无抗战决心。李烈钧去了南京之后,于1月30日密电冯玉祥称:“弟之行动尚易,公之出处较难。在张虽难骤生大效,尚可待机。南来则完全

失去作用,意外之事,则更难预料,故公宜取猛虎在山姿势,弟则相机为之。介石已赴赣,弟以赣人资格去电欢迎矣,俟有覆电,再看形势。现在南京诸人真可谓均无作用耳。”^⑮李烈钧支持冯玉祥在张家口伺机而动,对蒋介石能否真正抗日尚处怀疑之中,对蒋介石周围的人更是失望已极。

二、态度转变:力劝冯玉祥南下与蒋合作

李烈钧入京后,了解到蒋介石有准备抗战的决心,此后对蒋介石渐渐改变了以往的看法。长城抗战之前,李烈钧认为以往抗日,蒋介石没有下定决心,中方不能集全国之力抵抗日军,遂屡屡受挫。出于这一认识,1933年3月7日,他致电蒋介石说:“虽日人野心未已,恐更猖獗,有公领导挽救无难。”^⑯也就是说,李烈钧对于中央抗战抱乐观态度。现在蒋介石也表明其抗日态度,他认为对于日本“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”,“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,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。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。”^⑰出于这一认识,其派中央军第十七军,下辖第25师、第2师、第83师共三个师开赴古北口前线。这非常鼓舞李烈钧,他相信我方应当有可观的战果,甚至还鼓励别人说:“蒋委员长北上誓师抗日以后,前线的军事有很好的配置,因此抗日的形势益加巩固。如能按照计划积极进行,前方的军事很可以乐观的。”^⑱为此,李烈钧还劝冯玉祥往石家庄一会蒋介石,当时这一建议为冯玉祥所拒绝。可见,李烈钧对于蒋介石的抗日表示认可,其反蒋的态度亦为之改变。

李烈钧北上视察战事,同时对北方的抗战情况比较了解,对于此后的抗战,其亦有新的认识。如1933年4月8日李烈钧在上海青年会大礼堂的演说时宣称:“中日争端,绝非一二年短时间所可了结,最短亦须十年八年,甚或须二三十年,或竟延及百年。”故他提出,“今后希望政府有整个之计划,否则任令各地方作局部之应付,虽亦足以表示民气,但于整个战局无济。”^⑲此后,李烈钧对于蒋介石寄予厚望,希望其能领袖群雄,共同抗日以救危亡。如1934年4月13日他发电给蒋介石说:“盖今日国家大权名虽分掌,实则系公。”^⑳同时,又写信给蒋介石说:“顾今日救国事业成败系公一

身”。^②他认为只有蒋有此实权、威望出来做政府领袖,掌控全局做好抗日准备,领导全民抗战。

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,还有城下之盟,故一直反对政府的冯玉祥出面领导察省抗战,冀以收复失地。对于冯玉祥领导察哈尔抗日,在其筹划之初李烈钧认为:“在察哈尔太险,在察抗战无胜利把握,不如把抗战精神带到南京,联络主张抗战的同志,一致对蒋施加压力,迫使蒋共同抗日。”^③说明,李烈钧对冯玉祥在察哈尔的行动不是全力支持,他更希望冯玉祥能够南下与蒋合作,促蒋抗战。在冯玉祥1933年4月4日致胡汉民电报中也曾提及李烈钧的态度。他云:“协和即于此时来张,声述南京政府及蒋之措置,并钦邀祥参加政府。惟协和表示:若吾另有具体办法,固可自动进行;若办法尚未确有把握之时,可屈与委蛇,以减少阻碍,而便于工作进行。”^④换言之,李烈钧此时对蒋介石抗日有相当期望,对冯玉祥在察哈尔的行动不是全力支持,他认为冯玉祥掀旗抗日没有太大把握,与其铤而走险反蒋抗日,不若与蒋介石合作抗日,遂希望冯玉祥能够南下以促蒋抗战。对此,冯玉祥在三月十二日记有:“协和先生劝我南行,我说如有诚意对国家,再说吧。”^⑤冯之意是看蒋介石有无抗日的诚意,要是蒋真有抗日行动,那时可以南行合作。此时,冯玉祥意在抗日反蒋,李烈钧未能改变其初衷。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到李烈钧在蒋介石授意下劝冯玉祥南下与之合作,并没有敷衍蒋介石,而是力劝冯玉祥不可轻易反蒋。

冯玉祥驻陞张垣坚持抗日,不肯南下与蒋介石合作。为减少蒋介石的敌视,李烈钧尽量为冯玉祥开脱解释,他致电蒋介石云:“唯据烈钧观察,焕公唯一志愿在抗日破敌,渠在此颇能维系一方面之军心,而他方亦多有遣使聆教者,焕公皆以死报国勉之,前线作战遂呈奋发。今若骤离,或亦影响于士气,久拟入京,迟迟未行者职是故也。然焕公亦不欲久居于此,将来行动仍必尊重中央与诸友之意。”^⑥1933年3月26日,又与各报记者谈话云:“中央政治有中枢领袖负责,冯来京无益,祇望能效命疆场。”^⑦

后来蒋介石为表示抗战,前来保定督军,曾派李烈钧请冯玉祥到此会晤。李烈钧1933年4月5日曾向记者表态云:“蒋、冯二公此次当有会

晤之机会也。”^⑧然而最后还是被冯玉祥所拒绝。对此,事隔一年之后,1934年5月份当冯玉祥游览胶东到烟台时李烈钧又由南京赶来,据宋丰修回忆,仍劝冯赴南京,并说“蒋已一再表示抗日”。^⑨高兴亚对此回忆则更加具体,他称:“李烈钧批评冯玉祥有两次失掉机会:一是由峪道河到南京的时间太早;一是组织抗日同盟军的前夕拒绝赴保定与蒋介石见面。其意是认为这样做表现出与蒋决裂太甚,以致难以转圜。”^⑩换言之,李烈钧对于冯玉祥激烈的反蒋行为并不表示赞同,其意乃在调解蒋冯关系,冀望以冯促蒋早日实现抗战,以救民族危亡。

三、志在调解:弥缝蒋冯关系,力促和平解决

冯玉祥就职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后,李是加以支持的,然而其对政府措置也深表理解。如在1933年6月11日前后,他致电给冯玉祥说:“政府既不便张抗日旗帜,宜有妥善办法,与公商榷。”^⑪换言之,李烈钧对政府抗战表示理解,绝不可能支持冯玉祥反抗政府。其调节方案并没有抛开政府,而是希望政府能够授权冯玉祥出面领导抗日,而不是冯玉祥脱离政府。该论在本人的《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》一文有详细讨论。

为全力调解蒋冯关系,李烈钧强调冯玉祥是对外而非对内,吁请政府授冯玉祥以抗日名义。如1933年7月15日,他致电国民政府、中央党部、行政院等部门说:“烈钧愚虑,以为政府亟应明令授权,示以方针,共扶危局。”^⑫1933年7月28日,他又向蒋发电说:“惟察省今当强敌之冲,板荡至此,或为选将之时,是否即以该方重任,仍责成焕章,使其前被推戴于人民者,今后听命于政府。”^⑬

后来,抗日同盟军处在政府军和日军双方包围之际,李烈钧又成为和平解决该事变不可代替的调解者。冯玉祥于七月廿六日特发电请李烈钧为之调节关系,他称:“现康庄停有徐庭瑶兵车十七列,王以哲第七旅开怀来。而康庄、怀来、保安、下花园间,复停有中央铁甲车六列。即关、庞、刘、李等部,亦正向我采取大包围形势中。弟本抗日救国之旨,曾迭作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声明。望公

努力和乎运动,区区之意,实不愿以抗日武力,为国贼作鹬蚌;且在步步紧迫之下,更不愿鹬蚌相持,徒为渔人快意也。”^④

李烈钧虽然对于抗日同盟军予以大力支持,甚至摇旗呐喊。但为冯玉祥个人计,其基本态度还是劝其南下入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。劝说冯玉祥下野之事,“冯玉祥当时犹豫不决”。^⑤李烈钧自己的意见不被冯玉祥所动,最后又动员黄郛从中斡旋。为此,他1933年7月24日去电给黄郛称:“焕章对政治不满,与吾人殆相同,然其举动则在抗日救国,公必能体会而维系之也。现拟专电焕章,劝其念政府苦衷,尊公等雅意,共商救亡图存之法,并专员诣说,务底于成,亦望我公此时特为虚怀相处,且俟下走斡旋也。”^⑥经过李烈钧的动员,又兼念及以往黄冯关系,黄郛为此亲自前往张家口劝说冯玉祥。据陈英茨称:“黄郛到张家口同冯玉祥进行了彻夜长谈。黄郛讲由于实力过分悬殊,你若抵抗不能取胜。还说同盟军内部不稳,特别强调了共产党同你冯玉祥两条心,摆出了诸多事实。这番谈话,使冯玉祥感到蒋介石、何应钦对自己内部情况了如指掌,并非完全挑拨离间之词。”^⑦经过黄郛一番点拨,冯玉祥意识到抗日同盟军已经无法继续举旗坚持,遂决定通电下野。如胡家权就云“正在处境微妙的时候,北平军分会的代表黄孚(亲日派)突然来到张垣。冯、黄密谈一夜”,“黄孚走后,张垣即传出冯玉祥将军要下野引退的消息。”^⑧

同时,蒋介石亦请李烈钧出面斡旋,故李烈钧“也来劝冯玉祥下野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,”这让参加同盟军的姚铭枢也难以理解,他回忆时还说以往李烈钧是支持冯的,然而“现在李烈钧却一反常态,劝冯玉祥下野”。^⑨对此,李烈钧担心冯玉祥误会其偏袒蒋介石及其政府,派代表温晋城来,“述诉李先生自从同盟军收复多伦后,宣传呐

喊之状况”。^⑩可见,李烈钧劝说冯玉祥南下与蒋合作并非是敷衍蒋介石。“李烈钧于8月11日在庐山多次与蒋介石晤谈,蒋保证‘察事和平解决’。”^⑪至此,一触即发之内战得以避免。李烈钧抱病奔走在蒋冯之间,正如1933年8月7日致蒋介石电中所云,“所以屡为言者,以前途辽远,欲公等略复夙好耳”。^⑫换言之,无非为顾全大局,促蒋冯和好,实现共同抗日以救民族危亡。

冯玉祥离开张家口移居泰山之后,方振武与吉鸿昌继续抗日讨蒋。其实,冯玉祥还是与闻其事的。但1933年9月1日李烈钧对与大白社记者称:“冯先生既已离察,绝不顾问此事。”另外还一再促动冯玉祥南下与蒋介石合作抗日。故云:“当冯先生离察时,中央迭请其入京洽商国事,共谋大计。冯先生颇有入京之意,但何日启程,须视其环境如何而定,谅不久当可实现。”^⑬

综上所述,中原大战之后,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非常不满,其认为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责任主要在蒋介石。故李烈钧支持冯玉祥在北方倒蒋,甚至出谋划策,奔走其间。长城抗战之后,李烈钧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抗日有了新的认识,认为抗日救国惟有团结在蒋介石周围方有希望,而冯玉祥却仍力谋倒蒋。换言之,在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筹划之际,李烈钧的主张是力劝冯玉祥不可轻举妄动,还是南下与蒋合作更加适合。对于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战,李烈钧一方面予以支持,一方面对政府表示理解,从整个局势出发,还是力劝冯玉祥下野南行与蒋介石合作。这才是李烈钧的基本政治态度。对于李烈钧的意见,冯玉祥予以保留,李烈钧为此还动员黄郛前往张家口劝说,遂使冯玉祥下了决心,收束军事,倒旗下野。后来,冯玉祥1935年10月离开泰山参加国民党五大也是在李烈钧的促动下实现的,该研究限于篇幅,本人拟另文加以探讨。

注释:

①王晓荣,《李烈钧等与冯玉祥在30年代初的反蒋抗日活动》,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4期。王晓荣,《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日》,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0年第1期。付丽宁、黄晓弘,《“九一八”后李烈钧“协和”国民党内争考述》,《雁北师范学院学报》2002年第4期。郭绪印,《冯玉祥与李烈钧的友谊》,《民国档案》2003年第1期。王英维,《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》,《井冈山学院学报》,2009年第3期。

②③⑥⑦⑨⑩⑪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,《冯玉祥日记》第3卷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,分别引自第95页,第

456-457 页,第 531 页,第 568 页,第 622 页,第 540 页,第 692 页,第 628 页。

④ 高兴亚,《忆与冯玉祥的谈话》,《文史资料存稿选编》军事派系(上),中国文史出版社,第 310 页。

⑤ 项立岭,《李烈钧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,第 156 页。

⑧③⑤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编,《中华文史资料文库》第九、十、十一卷,《军政人物编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年版,分别引自第 456 页,第 464 页。

⑬ 冯玉祥选集编辑委员会:《冯玉祥选集》(中),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,第 768 页。

⑭③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,《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》,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,分别引自第 134 页,第 146 页。

⑮⑯⑰⑱⑲ 冯玉祥选集编辑委员会,《冯玉祥选集》(下),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,分别引自第 21 页,第 24 页,第 51 页,第 92 页。

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周元高、孟彭兴、苏颖云,《李烈钧集》(下),中华书局 1996 年版,分别引自第 736 页,第 747 页,第 751-752 页,第 784 页,第 758 页,第 739 页,第 746 页,第 750 页,第 762 页,第 765 页,第 768 页,第 768 页,第 771 页,第 774 页。

⑳ 曹伯言整理,《胡适日记》卷 6,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,第 207 页。

㉑ 高兴亚,《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二三事》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《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》编审组编,《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,第 562 页。

㉒④⑩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,《冯玉祥日记》第 4 卷,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,分别引自第 43 页,第 123 页。

㉓ 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,《宋聿修回忆录》,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,《开封文史资料》第 13 辑,第 107 页。

㉔⑩ 高兴亚,《冯玉祥将军》,北京出版社 1982 年版,第 169 页。

㉕⑦ 陈英茨,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葬送的悲壮故事》,《炎黄春秋》1995 年第 9 期,第 8 页。

㉖⑨ 姚铭枢,《忆我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之始末》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张家口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《张家口文史资料》第 19 辑,1991 年版,第 90 页。

㉗⑪ 张竞渊编,《武宁文史资料》第 6 辑,《李烈钧年谱》1997 年版,第 81 页。

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 Lie-jun and Anti-Japanese War in Chahar

WANG Ying-wei ZHAO Guo-cai ZHANG Jun

(Jining Normal University, Wulanchabu 012000, Inner Mongolia, China)

Abstract: After the Central Plains War, LI Lie-jun was very discontent with CHIANG Kai-shek and his government, thinking that CHIANG Kai-shek should take on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Kuomintang's internal division and followed by his support of FENG Yu-xiang's objection to CHIANG in the north. Having a new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anti-Japanese after the Anti-Japanese Resistance along the Great Wall, LI Lie-jun thought resisting Japan to save the nation unity must depend on CHIANG Kai-shek, which would be promising for Kuomintang, but FENG Yu-xiang still objected to CHIANG. In the Anti-Japanese War of Chahar led by FENG Yu-xiang, LI Lie-jun supported FENG and understood the government; taking the whole anti-Japanese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, LI urged FENG Yu-xiang to relinquish power and cooperate with CHIANG Kai-shek. This is the basic political LI Lie-jun's attitude.

Key words: LI Lie-jun; Anti-Japanese War of Chahar; Anti-Japanese Resistance along the Great Wall; FENG Yu-xiang; CHIANG Kai-shek; Resistance of Japanese and objecting to Chiang